

呂留良年譜長編

卞僧慧 撰



中華書局

呂留良年譜長編

卞 僧 慧 撰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呂留良年譜長編/卞僧慧撰. —北京:中華書局, 2003
ISBN 7-101-03891-3

I. 呂… II. 卞… III. 呂留良(1629~1683)—年譜
IV. K82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21184 號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呂留良年譜長編

卞僧慧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6 1/4 印張·4 插頁·361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35.00 元

ISBN 7-101-03891-3/K·1608



呂留良先生畫像，從原刻本《慙書》攝出

數載知交極荷
厚雅自愧無所仰裨故不敢復受
館穀耳况敢高卧而受無功之祿耶
尊意則心誌之 尊帖當面時繳還
也
孟舉道翁 手乏
輪拜復

呂留良手迹，
從 1917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呂晚村墨迹》攝出

呂晚邨評點

錢吉士先生
全稿

天蓋樓藏板

呂留良評點《錢吉士先生全稿》康熙本書影

康熙丙申仲秋新鐫

楚部車雙亭編次

晚邨呂子評

語正編

附惠書親炙錄

金陵顧麟趾梓



車鼎豐編《呂子評語》書影

前言

呂留良在清代文字獄中占有重要地位，可是長期以來，他的實際情況却很不清楚。

呂案未起時，天蓋樓評選的八股文流行極廣，影響很大。天下士子，誦其書，尊其人，稱之爲“東海夫子”。地方大員到任，亦每贈送匾額，以示崇敬。甚至有人還認爲“明末皇帝該呂子做”。

到了案發以後，株連之禍極慘，人人戰慄，避之惟恐不及。他的著作遭到禁毀，其交游者著作中涉及他的地方也被挖改或刪毀。甚至《大義覺迷錄》這部雍正皇帝聲討他的論旨彙編，本來是頒布天下學宮、飭令士子人人必讀的書，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諭令收繳禮部，不得私藏。在士大夫中，如全祖望、徐大椿、袁枚、紀昀諸人，不論考史迹，辨醫理，談神怪，無不羣起而攻之。朝野上下，相互呼應。從此人人頌聖，莫敢立異。呂留良其人其事，已若有若無。

到清朝末造，留良詩文，才又得刊布。民國以來，章炳麟、梁啟超、孟森諸先生于留良事跡，并有撰述。在抗戰前出版物中，容肇祖先生的《呂留良及其思想》和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更有較詳細精闢的論述。抗戰期間，郭象升先生所輯《語水公案雜記》，蒐羅遺事，遠比錢振鏗先生的《晚村集偶證》爲多。不過還有不少問題沒有觸及，或觸及了而沒有深入探討。爲了比較全面瞭解呂留良的實際情況，過去曾零星地搜集了一些資料，近年又續有所獲。因參照前輩研究成果，編成這部年譜長編，上溯其先世，中述其言

行，下究其影響。茲就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試作剖析。

一 呂留良和明朝統治集團的關係

呂留良的本生祖父呂爌和淮莊王的女兒南城郡主結婚，成為淮府儀賓。清世宗指責留良自附于明代王府儀賓之孫，反對清朝，即指此事。

呂留良先世是商人，到了他曾祖呂相，又投資到土地上，據說財富達到“盛至傾邑”的規模。可是社會政治地位却很低，經常受到敲詐勒索。

呂相在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年）從沔陽州通判致仕家居。十七年，兒子呂爌尚南城郡主。十八年，嘉靖皇帝到湖北謁其父陵，謠傳要巡幸浙江。為迎接聖駕，要一筆很大的開銷。浙江地方官要“盡籍里有餘財者佐縣官急，敢匿者殊死”。一時人心惶懼，呂相尤為不安。幸虧賢明的崇德知縣喻冲將此事給頂了回去，才使他得以脫免一場大災殃。所以他激動地說：“相于時拜侯之賜實侈矣！”

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崇德縣遭到倭寇的洗劫，呂相一家也不例外。洗劫前，呂相已輸粟三巨艘餉軍。及再議修城，又派呂相捐出修繕費的半數。還有別的徵派，壓力是很大的。幸虧呂相的次子呂炯中了舉人，呂相的困境才稍得緩和。

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年），呂爌以助皇帝大工的名義辭掉宗祿四百石。呂相死後，南城郡主為跟隨呂爌返回崇德，于隆慶五年（一五七一年）又辭掉她那一份宗祿四百石，首創明朝建國以來儀賓、郡主辭祿歸養的特例。當時史學家朱國禎以《郡主侍養》的條目，用特筆寫入他的《湧幢小品》中。這并不一定是呂爌夫婦的風格高，而實際上呂家自有經濟來源，不希罕吃朱家皇朝的宗祿，何況在政治上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明朝在政治上是重甲科的。呂留良在晚年給費彥方作的墓誌中充分發揮了他的不滿情緒。他的父祖兄弟中，只有叔祖呂炯和本生父呂元學兩人是舉人，沒有出過進士。他這一家不屬於明朝能參預掌握政權的統治階層範圍之內。

看來，攀上這樣一門皇族親戚，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給呂家帶來多大好處。只有呂炯中舉，和後來呂燠夫婦辭祿歸養，脫離了王府，在家中懸上“許歸堂”的匾額，在社會上才有些影響。其實，郡主無所出，儀賓後裔並無皇族血緣。呂家和朱家的關係，不過如此。

二 呂留良的反清立場

清世宗說：“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復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而所以如此，清世宗說呂留良“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為大言，棄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事實是怎樣的呢？

當呂留良十七歲的時候，清兵南下，不僅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慘絕人寰，其他城鄉，也遭燒殺洗劫。面對清軍瘋狂毒害百姓，嚴重破壞生產的野蠻殘暴的罪行，呂留良毀家紓難，跟隨其兄長全家參加抗暴鬥爭。左股中箭，留下終身創痛。兵敗之後，他的姪子呂宣忠獨自引罪，慷慨殉難。留良為此嘔血“數斗，幾絕”。

有這樣血淋淋的慘痛經歷，“深怨本朝”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呂留良返回家園後，作為身有叛逆嫌疑并有些家產的叛逆家屬，日子是不好打發的。支撐了幾年，到二十五歲，不得已易名就試，成了清朝的生員。對外關係有所緩解，內心苦痛却更沉重了。挨到三十九歲，終於棄去青衿。

綜計呂留良一生，活了五十五歲。在明朝活了十六七年。在清朝統治下的三十八九年中，反抗和隱忍了九年，出就試與清廷虛與委蛇了十四年，放棄功名過反清志士生活又十七年。從十七歲算起，有二十五年是徹裏徹外反清的。就是在應試的十四年裏，反清活動也沒有停止過。只有站在清朝統治集團一邊，或在屈從于清政權的淫威下，才會按着雍正皇帝的調子，指稱呂留良是反復無常的叛逆之徒。

三 呂留良的歷史地位

呂留良在他臨死前不久曾說過：“吾行年雖短，然他日這篇行狀，却自難做。平生更歷境界，難殫述也。”這話不假。因為他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動蕩時代，在錯綜複雜的環境裏，一個人的經歷是複雜的，其歷史地位也是不容易評定的。

呂留良處在明清之際。明代已進入封建社會晚期，社會的病態，在政治、經濟、習俗、思想、文藝等方面都洩露無遺。新生的經濟、政治、思想等還是孱弱的萌芽。舊勢力幾乎結為一體，新事物處于被摧殘、受壓抑的地位。

清朝入主中原，挾其野蠻武力和落後意識，對明朝的腐朽事物一拍即合，結成一支雄厚力量。而反清方面，新舊雜糅，勢力分散，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軍事對抗力量，最後為清朝各個擊破。

在清朝反動統治下宣傳反清思想，呂留良採取了一種異乎尋常的辦法。他利用八股文作為宣傳工具。他認為“今欲使斯道復明，捨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秀才都念八股文，他就在批選八股文的字裏行間宣傳他的政治主張。

呂留良把評選的八股文發到全國大販書市場之一的南京承恩寺書坊發兌。發行情不斷增加，感到代理書坊不可靠，就改為自

營。他自己到過南京，又派兒子呂公忠兄弟去南京經理售書，兼採訪所需書籍。還派公忠到福建開拓市場。在八股文之外，還刻印《二程全書》、《朱子遺書》、《儀禮經傳通解》，以及《唐鑒》、《稽古錄》等書發賣。據說賣一批書可達四千金。通過經營書業，就可獲得生活來源和再生產資金，不必再求仕進。

隨着商品的售出，呂留良也宣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堅持夷夏之防，嚴立出處、去就、辭受、交接的界限。他攻擊君主私天下的私心和奴役人民的暴行。他認為君臣尊卑相去只一閭，而不應相去懸絕。他認為臣之事君，在於“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而不在高官厚祿。他非常蔑視“只多與十萬縑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的人。

呂留良的政治思想和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裏的政治思想很相似。可是《待訪錄》遲至清末才為人傳誦，當時沒有流通，未見社會效果。而呂留良書暢行天下。不少人借以獵取功名；有的人對他衷心崇拜，設位奉祀（如連州知州朱振基）；有的人接受他的政治思想，掀起震驚一世的反清大案（如曾靜等）；即使在清朝皇帝嚴厲聲討、大肆屠殺之下，還有人憤不畏死，堅持為呂留良鳴冤叫屈，始終不懈（如齊周華）。其政治影響之深遠，可以想見。

在清朝統治下，實行呂留良為子孫留下的遺策，須防止兩種傾向。一是不甘寂寞，不肯放棄仕進的道路。這一傾向的契機，早經張履祥指出。他在《與凌淪安》信中寫道：

今茲東莊之坐，在私心則因往來冗雜，耳目煩亂，非藏修之地。亦竊見晦兄家衆日增，世業已損，自今以往，事正多而費正大。及時力謝塵鞅，以其子姪讀書其中，使知《幽風》、《無逸》之義，淡膏粱文繡之情，以為經遠可恒之計，則于聖賢“正己而不求于人”之明訓，可以世守也。否則無論目前利鎖名

羈，難以自脫；異時子弟，未必皆賢，馴習城市，比之匪人，其患可勝言乎！乃自春夏以來，察其內外之情，無不以是為厭苦，而急欲入城矣。此亦野人鹿豕之性，所不能適者也。（參閱永曆二十六年有關其他引文）

後來呂留良對公忠更痛切地指出：

一徑南行，親知皆有惋惜之言，兒得無微動于中乎？人生榮辱重輕，目前安足論，要當遠付後賢耳。父為志士，子為新貴，誰能不嗤鄙；父為志士，子承其志，其為榮重，又豈舉人進士之足語議也耶？兒勉矣！餘無所囑。

可是後來呂公忠（即呂葆中）還是走上舉人進士這條通向新貴的仕途，沒有遵守其父的遺訓。

另一傾向是流于市井謀利之徒，放棄讀書明理、敦本重道之業。呂留良給其子辟惡的信中就闡明這個問題。

于汝兄案頭見汝字，“欲聚精會神謀治生之計”，此無甚謬。乃云“文章一事，當以度外置之”，此錯却定盤針，連所謂“治生之計”，通盤不是矣！吾之為此，賣書非求利也。志欲做法鄭氏，則其為衣食制度之本不可不先足備，正欲使後世子孫知禮義而不起謀利之心，庶幾肯讀書為善耳。若必置文章而謀治生，則大本已失，所謀者不過市井商賈之智，孟子所謂“隳之徒也”，焉有君子而可以隳自居乎！昔孟母之教子，再遷近市，孟子戲為賈街。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之學側，卒成孟子。吾之使汝輩賣書，固失孟母之道矣！吾向不憂汝鈍而憂汝俗。此等見識，乃所謂俗也。醫俗之法，止有讀書通文義耳。今乃欲“度外置之”，其繇俗而趨于汙下，不知所底矣！喻義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實人禽中外之關。與其富足而不通文義，無寧明理能文而餓死溝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與汝輩同

之者也。豈願有一黠子哉！（《呂晚村先生家訓真蹟》卷三）

到了家遭曾靜之難，在殺戮之餘，遺孽流放到東北為奴，屈辱的地位難于逃脫，仕進之路和賣書之路都已斷絕。可是他的後代確實堅持讀書這條路，直到清朝滅亡也沒有放棄。民國初年，章炳麟到東北，見到呂留良的“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臺隸，求師者必于呂氏。……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

在封建制度下，廣大農民深受壓榨，救死還來不及，哪有時間讀書。讀書人不入仕途，要想耕讀傳家，最後還得放棄讀書。經商收入，遠較躬耕為優，可不廢讀；而以塾師、醫師為業，也需要讀書。呂留良的設想，是不食清朝俸祿，自求生存的一條可行道路；使其後裔，在遭難後，還能遵行達一二百年之久。

呂留良在武裝反清鬥爭失敗後，為了長期堅持反清立場，並設法擴大影響，和黃宗羲相比，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黃宗羲家世讀書做官，與呂留良先世以經商起家有所不同。黃宗羲在明朝有較高的政治社會地位，他們兄弟“天下咸慕重之。一二新進名士，欲游其門不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他不用為自家的生計操心。清兵南下以後，力圖恢復。出生入死，久而未成。展轉避地，僅免于死。痛定思痛，于是有《明夷待訪錄》之作。黃宗羲幼遭家難，其父黃遵素死于闖禍。闖人的後臺就是昏庸無道的皇帝。從血淋淋的家難中痛切體驗到：君主專制制度是天下大害。可惜的是他在《明夷待訪錄》書中大聲疾呼、竭力宣揚的民主思想，在當時不能公開宣傳。而且黃宗羲在思想上反對君主專制制度，而在實際中却並沒有找出一條推翻、或者退一步說擺脫君主專制制度的可行途徑。現實非常嚴峻。開門七件，何以為計？精神生活，又將何託？矛盾層出，連環難解。煎熬既久，遂不得已而取此

下策：不列身朝班，而奔走權門。自己要依靠官吏提倡，才能開門講學。爲了兒子的出路，他只得在給清內閣學士徐元文信中說：“昔聞首陽二老託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我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總之，還得依附君主專制制度，以求生存。至此，夷夏之辨，民貴之論，遂成空談。其心情之惡劣，可以想見。交游齟齬，亦易發生。凡此皆屬事之極可傷者。

等而下之，前朝名流之託迹新朝者，大多戰戰兢兢，畏威懷刑。所以陳其年《虞美人·詠鏡》詞中有“我亦受人憐惜爲人磨”之句，顧橫波夫婦讀之而相向嗚咽。只能偷生視息，苟且取容。古人出仕，“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已渺不可尋，更何論民主思想！“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原因就在這裏。這就是在新舊社會交替的大動蕩時代，黃宗羲所屬的舊型知識分子不得不走的道路：脫離生產，依附舊的君主專制制度以爲生；縱有先進的理論，也不能依照之以立身處世，更無從爲其實現而奮鬥了。

呂留良則屬於另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他有有限的農業收入，地租，他能爲農；不忘讀書，有思想，有見識，借着選評語錄、詩文、八股宣傳他的思想，他能爲士；組織刻書、校書、印書，他能爲工；爲所印書開拓市場，他能爲商。呂留良是不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他集士農工商于一身，有學有術，有衣有食，基本上能做到“正己而不求于人”。當然，在清朝統治下，在社會上活動而絕對不和清朝各級政府打交道也是不可能的。遇到發賣的書被人吞沒，家中墓地樹木要被砍伐等事，也要託人情關係。不過不像黃宗羲等人那樣依靠統治者。章炳麟認爲讀書人不能只憑文字謀生，要另有資生之具。他本人在清末覃精學術，奔走革命，而又兼治醫術，亦即此意。

曾靜一案，是呂留良通過評選八股文向讀書人宣傳“夷夏之

防”的最大收穫。如果呂留良還活着，他能同意曾靜等上書岳鍾琪策反與否，雖不可知；但是曾靜等這一行動是從呂留良的書中得到啟發，則無可置疑。追根尋源，清政府定呂留良為逆案首惡並不冤枉。

不僅于此，在此之前，呂留良的得意門人董采結識明崇禎帝的流亡兒子朱慈煥，並輔導、監護皇孫朱和杕（堯）等，最後發生了“朱三太子案”。事前，董采曾向李堪透露過。案發後，李堪就追溯到呂留良頭上來。清廷搜查了呂留良的家，拿問了他的後人。康熙皇帝竭力縮小朱三太子的影響，說他是假冒。後來追述時，索性用，同時發生的“一念和尚案”代替“朱三太子案”。以致近世中外學者探討此案，多把呂留良和董采（字載臣）放過〔注〕。

至于雍正皇帝，他最害怕揭發他在宮廷鬥爭中的種種失德。他利用曾靜案，竭盡全力追剿皇室中反對派散布的流言。于是彌天要犯曾靜成了首功，得到赦免。殘酷鎮壓呂留良一門，以為收場。當時人不理解這是大皇帝別有用心心的“出奇料理”，竟有人如唐孫鎬、齊周華出來聲討曾靜，替呂留良鳴不平，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到了乾隆皇帝，時移勢異，又感到雍正皇帝的作法如果仍然奉行不改，恐不免欲蓋彌彰，遺臭萬年。即位之初，就公然違背大行皇帝當年反覆丁寧、不許後世子孫改變的煌煌治命，竟捕殺曾靜、張熙等，收回《大義覺迷錄》。仍然繼續加強對漢族鉗制的國策。呂留良的逆案當然是翻不了的。最後又鎮壓了齊周華。

呂留良生在明末清初的大動蕩時代，他能憑他那一枝筆，引起了反清的朱慈煥、曾靜和齊周華三大政治案件，驚動了清朝全盛時期的三代皇帝，使他們專制暴君的凶殘面目，在廣大人民面前，充分暴露出來。這是很了不起的。

呂留良的反清，實質上不是什麼兩姓或兩族誰統治天下的問題，而是社會發展的方向問題。在這一點上，呂留良是不自覺的。清朝統治者，就是在盛世，其政策也是爲了維持舊的、沒落的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秩序，是反動的。由於初期的瘋狂屠殺人民，嚴重破壞生產的罪惡政策再執行下去，就要自食其果，無法維持其政權，所以才改行恢復生產，發展生產的政策。所謂發展生產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再任其向前發展，就會威脅其賴以託命的封建統治基礎，所以要嚴厲禁止。可是時代的要求，當時全國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趨勢，却是要求突破舊框架，建立新的政治、經濟、文化秩序，發展商品經濟。

呂留良的實際活動，正是把商品經濟的四個環節，士農工商，攪成一股力量，向他所反對的清朝統治政策較量。企圖通過經濟、文化的活動，實現他的政治理想，把社會推向前進。這就必然與清朝把社會拉向後退的政策發生尖銳的矛盾。這一鬥爭的實質，呂留良並沒有充分認識。由於他的階級基礎薄弱，清朝憑藉的舊勢力仍然很大，這一次鬥爭，以齊周華被殺而告結束。但是，清朝的反動政策和黑暗統治仍然在繼續制造災難，迫使人民起來反抗。呂留良的影響仍然成爲一股滾滾暗流傳給後人，推動歷史前進。大清皇帝挖空心思想顛倒是非、扭轉歷史進程的意圖終於化爲泡影。作爲歷史人物，呂留良是有他的特色的。

呂留良一生的活動是多方面的，即以他的學術活動而言，也不僅僅只是利用八股文的評語宣傳他的反清思想。他在尊崇朱熹，提倡宋詩，纂修明史，研究醫學，以及詩文書法，刻印制硯等等，都有可記述的。他的先世和他身後的影響，也有許多未發之秘。爲全面瞭解呂留良這一歷史人物，本書集中不少散見和稀見資料，以